



A CONTRASTIVE STUDY OF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致使结构的汉英对比研究

李炯英 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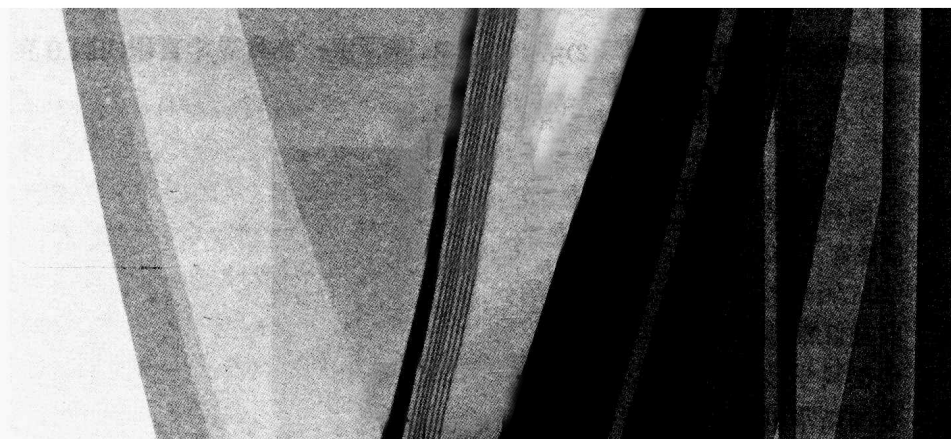


南京邮电大学人才引进计划项目
(编号NY207032) 研究成果

A CONTRASTIVE STUDY OF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致使结构的汉英对比研究

李炯英 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意象图式的范畴化理论、原型的范畴化理论、语义参数理论和认知隐喻理论作为致使结构对比研究的认知语义基础,按照“致使事件→意象图式→语义范畴→句法结构”的研究路径,充分利用汉英语料库的丰富语料,重点探讨和对比研究了致让类、使让类、控制类、对抗类和意愿类等五个语义次范畴的汉英致使结构,以期丰富致使结构研究的认知语义学理论、促进汉语致使兼语结构的本体研究、提供致使结构汉英对比的研究模式、客观反映汉英致使结构的语义句法特点。本书可以作为认知语义学研究者、语言教育工作者和语言学习者的参考用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致使结构的汉英对比研究/李炯英著. —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2. 6
ISBN 978-7-312-02989-9

I. 致… II. 李… III. 语义结构—对比研究—汉语、英语 IV. ① H13
② H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0351 号

出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 96 号,邮编:230026
<http://press.ustc.edu.cn>
印刷 安徽江淮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710 mm×1000 mm 1/16
印张 22
字数 400 千
版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0.00 元

前言

致使结构是人类语言中普遍存在的语义结构。现代汉语中由致使动词构成的兼语结构在英语句法上表现为宾补结构(SVOC)。本书以意象图式的范畴化理论、原型的范畴化理论、语义参数理论和认知隐喻理论作为致使结构对比研究的认知语义基础,旨在通过探究致使结构中致事与所使之间的施力互动关系,建构汉英致使动词的语义分类框架,并以此框架为基础,通过跨语言的对比研究,揭示汉英致使结构的语义特点和句法表达形式的差异。

本书的总体研究思路是:以对比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义语法学等理论为指导,按照“致使事件→意象图式→语义范畴→句法结构”的研究路径,充分利用汉英语料库的丰富语料,探寻汉英两种语言共有的致使语义范畴和不同的句法表达形式。

“凭语义而建立致使范畴,集致使范畴而建立语义互动关系,析语义互动关系而构建语义分类体系,借语义分类体系而搭建汉英对比平台”是本书的基本研究特点。

汉英致使结构的语义基础是致使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用意象图式来描写,Talmy(1988,2000)的“施力—动态图式”和 Wolff(2007)的“动态图式”体现了致使结构的各语义要素之间的关系。就汉英致使结构而言,致事和所使之间存在三种不同的语义互动关系:对抗关系、和谐关系和控制关系。根据不同类别的致使动词,其致使方式主要有行为性致使、言语性致使和意愿性致使三种。同时,致使动词中还存在一个封闭类,包括致让类和使让类两个次范畴。据此,我们把汉英致使动词分为致让类、使让类、控制类、对抗类和意愿类这五个语义次范畴。从语义要素及其相关的语义参数在汉英两种语言中的句法表达入手,对五个次范畴的致使结构进行语义和句法汉英对比研究,以期客观、全面地反映汉英致使结构的语义、句法特点。

本书的主要研究结论是:①致让类和使让类致使结构的主要区别在于 VP₂ 的自主性、致事的有生性和致使结果的已然性三个语义特征。汉英语义差异体现在致事[-有生性]的优先顺序和致使结果[+已然性]的表达。②控制类的致事和所使之间存在[+权力层级性]关系,汉英差异体现在语义对应性和 VP₂ 的句法表

达。③对抗类的致事和所使之间存在施力上的对抗关系。汉英差异主要体现在 VP₂ 槽位上成分的句法表达。④意愿类的致事和所使间关系和谐,其致使方式均为意愿性致使。汉英差异体现在语义对应和 VP₂ 句法表达。⑤在“帮助类”致使结构中,汉语存在一个“帮替”、“帮同”和“帮让”的语义连续统,而英语不存在“帮替”义。总的结论为:汉英致使结构在语义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显示出人类对客观世界致使现象和概念化的认知共性。其差异主要体现在句法表达形式上,尤其是在 VP₂ 槽位上。汉语 VP₂ 槽位上经常出现的是动词(短语),而英语致使结构中则经常出现名词或介词短语。

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构建了汉英致使结构对比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在理论层面上,首次建构了一个基于事件图式和语义范畴的致使结构汉英对比的语义分类系统。在方法论层面上,首次提出了甄别汉英致让义和使让义致使动词的“VP₂ 析使甄别法”,构建了“帮助”类致使动词的语义连续统图式,探究了“命令”类、“派遣”类、“选举”类、“帮助”类、“任凭”类等致使动词的义征表达式。

《致使结构的汉英对比研究》一书的理论价值在于其丰富了致使结构研究的认知语义学理论,促进了汉语致使兼语结构的本体研究,提供了致使结构汉英对比的研究模式。其应用价值在于为语言教学、语言学习者习得汉英致使结构和英汉互译提供重要参考。

目 录

前言	(i)
绪论	(1)
第一章 汉语兼语结构研究的学术背景	(6)
第一节 汉语兼语结构的古今演化轨迹	(6)
第二节 现代汉语兼语结构研究的回溯	(11)
第三节 汉语致使兼语结构的研究现状	(19)
第四节 汉语致使兼语结构研究存在的问题	(33)
第二章 汉英致使结构对比的研究思路	(38)
第一节 汉英致使结构对比研究的认知语义基础	(38)
第二节 汉英致使结构对比的主要研究方法	(72)
第三节 汉英致使结构对比研究的技术路线及其关键问题	(75)
第三章 汉英致使动词的语义分类框架	(80)
第一节 汉语兼语结构中致使动词的语义分类	(80)
第二节 英语致使动词的语义分类	(83)
第三节 汉英致使动词的语义对比	(90)
第四节 汉英致使动词的语义分类框架	(102)
第四章 致让类致使结构的汉英对比	(105)
第一节 汉语“使(让、叫)”的释义、分类与义征分析	(105)
第二节 汉语致让类兼语结构的句法语义分析	(111)

第三节	致让类致使结构的汉英句法语义对比	(118)
第四节	致让类致使结构的语义关系对比	(129)
第五章	使让类致使结构的汉英对比	(157)
第一节	使让句与致让句的区分与甄别	(157)
第二节	使让类致使动词的语义再分类	(163)
第三节	使让类致使结构的汉英语义对比	(166)
第六章	控制类致使结构的汉英对比	(185)
第一节	命令类致使结构的汉英对比	(185)
第二节	派遣类致使结构的汉英对比	(192)
第三节	任命类致使结构的汉英对比	(199)
第四节	祈请类致使结构的汉英对比	(207)
第五节	要求类致使结构的汉英对比	(216)
第七章	对抗类致使结构的汉英对比	(229)
第一节	劝说类致使结构的汉英对比	(229)
第二节	催逼类致使结构的汉英对比	(244)
第三节	阻止类致使结构的汉英对比	(256)
第八章	意愿类致使结构的汉英对比	(270)
第一节	允许类致使结构的汉英对比	(270)
第二节	任凭类致使结构的汉英对比	(286)
第三节	帮助类致使结构的汉英对比	(303)
结语		(320)
附录		(329)
参考文献		(332)
后记		(341)

绪 论

自 1898 年《马氏文通》引进西方语法学理论以来,汉语语法研究主要采用了为分析印欧语言而倡设的西方语形语法学理论模式。这种模式有时并不能完全适应汉语句子结构和特殊句式的分析和说明。汉语中有些语法现象无法运用印欧语言的语法学理论做妥善处理和分析。如果采用印欧语言的语形结构框架来解释汉语的某些现象,就很难对现代汉语的语言事实进行充分的描写和对语言现象做出科学合理的阐释。汉语中由致使动词构成的兼语结构就是这种情况。事实上,汉语中兼语结构的存在,与汉语和印欧语言对现实的编码机制不同有关。

印欧语言属于语形型语言,具有屈折变化和形态标志,对语言现实的编码机制以不可论证的任意性为基础。而汉语是一种语义型语言,以“意合”为主,没有屈折变化和严格意义上的形态标志。印欧语言的句法结构规则表现为:一是只允许有一个名词性词语充当主语,只允许有一个动词性词语充当谓语;二是实词词类和句子成分之间有整齐的对对应关系。与印欧语言的结构框架相比,汉语的句子构成有时可以没有主语,有时句子的谓语可以由几个动词性词语连续排列构成。

兼语结构中致使动词的语义特征是不同的有生性话题对行为进行控制和支配,是一个有生性名物使另一个有生性名物发出一种能对他事物产生影响的力量(徐通锵,1997)。自 20 世纪 20 年代刘复(1920)提出“兼格”以来,兼语结构研究一直是现代汉语句法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之一。同时,语法学界对兼语结构研究(一是兼语结构与其他相似句式的划界问题,二是兼语结构是否应是现代汉语特殊句式的问题)仍然存在着不同看法,并由此导致了是否应该取消兼语句的争议。

这种争议的缘由,究其本质而言,是研究者没有站在语言类型学的立场,套用汉语的语形语法学理论框架来研究汉语特殊句式,并由此引起矛盾所造成的。要想解决语形语法学理论模式与汉语事实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兼语结构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首先必须植根于汉语本体研究的沃土中,然后从人类语言的本质共性——语义性的视角入手,深入探讨兼语结构中致使动词的语义关系类型,建构语义分类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对致使结构进行跨语言的汉英对比研究,以揭示汉语兼语结构的存在价值。

汉语兼语结构和与之相对应的英语致使结构是汉英两种语言中的重要句法结

构之一,表达的核心语义都是致使义。根据语料库调查,它们在语言生活中的使用频率都非常高(赵淑华等,1995;Hollmann,2003)。基于致使动词的句法结构汉英对比,其研究价值主要有四个方面:

首先,完善汉语兼语结构的本体研究。汉语兼语结构和与之相对应的英语致使结构具有共同的认知语义基础,它们语义要素的排列顺序基本相同,符合汉英两个民族的认知习惯,使用频率高。然而,从类型学的立场出发,只有把国内外相关的致使结构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对比分析,揭示两者的语义和句法结构特点并研究清楚以后,才有可能建立汉语致使动词的语义分类系统,进而完善汉语兼语结构的本体研究。

其次,推动国内致使兼语结构研究的发展。虽然国内学者对致使兼语结构的研究历史悠久,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尚不成体系,还存在诸多问题(详见第一章第三节),内省性研究特征明显,特别是基于认知语义学和语义语法学理论的致使结构汉英对比研究更是微乎其微。本书拟以梳理和对比分析国内外相关致使结构研究理论和方法为契机,向国内系统引介和批判性评价国外相关研究方法和成果,冀此推动国内致使兼语结构研究的发展。

再者,提供致使结构汉英对比分析的研究模式。在致使结构研究中,不同语言学理论之间在研究方法上存在较大差异。本研究拟采用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从致事与所使的语义互动关系、致使动词的致使方式、致使结构的语义要素和语义参数、义征分析、意象图式、语义特点、句法表达形式等多维视角,对相关语言学理论和致使结构进行汉英对比研究。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本书为致使结构研究提供新的对比研究模式。

最后,促进语言学习者习得汉英致使结构。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地位的日益提高,对外交流日益频繁,国外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来华留学。由于致使动词构成的兼语结构是最重要的现代汉语句式之一,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日益凸显其重要性和复杂性。本书基于语料库的汉英对比研究无疑将有助于外国留学生习得汉语兼语结构,也必将促进国内英语学习者习得英语致使结构。

本研究的总体目标是:通过致使结构中致事与所使之间的施力互动关系以及致使动词的不同致使方式,建构汉英致使动词对比分析的语义分类框架,并以此框架为基础,通过跨语言的汉英对比研究,揭示致使结构的汉英语义特点和句法表达形式的异同。围绕这一总体目标,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

① 对现代汉语致使兼语结构研究进行文献综述,探究前人研究成果及其存在的问题,为本研究留下研究空间;

② 探明汉英致使结构对比研究的认知基础,确定本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③ 通过对致使结构中致事与所使的施力互动关系和致使动词的不同致使方式的分析,构建本研究的语义分类体系框架;

④ 通过对比分析致使结构的意象图式、语义要素和语义参数、致事和所使的语义互动关系,探究汉英致使结构的语义特点与差异;

⑤ 通过英语对现代汉语致使兼语结构的句法和翻译表达,揭示汉英致使结构在句法表达形式上的异同;

⑥ 通过对比分析,探明汉英致使结构语义句法差异的缘由。

基于以上研究内容,《致使结构的汉英对比研究》一书的基本研究思路是:首先,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确定本研究的对比视角,采用从语义范畴到句法形式的研究路径;其次,充分利用汉英语料库的丰富语料,确保本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与客观性;再次,基于致事和所使的施力互动关系,以及致使动词的不同致使方式,建构汉英致使动词的语义分类体系;最后,基于语义分类体系,对比分析各种类别致使结构的汉英语义范畴和句法表达形式,探究汉英致使结构的语义特点与句法表达差异。

本书主要采用如下几种研究方法:

1. 以对比分析为原则的描写方法

这一方法的理论基础是对比语言学的“双向性”和“描写性”思想。本研究属于汉英两种语言间的共时比较。只有通过对比分析,才能体现和描写汉英致使结构在句法和语义上的异同。

2. 从语义到句法形式的分析方法

采用从语义到句法形式的研究路径,按照“致使事件→意象图式→语义范畴→句法结构”的研究思路,充分利用语料库的丰富语料,对比分析致使结构的汉英语义范畴和句法形式,探讨与致使语义范畴中各种相关的语义参数在汉语和英语中的句法表达形式有何异同。

3. 语料库与人工甄别相结合的方法

为了使本研究结论更具可信性和客观性,本书的汉英对比研究建立在基于语料库的大量真实语料的基础上。通过大量语言事实的语义和句法对比分析,探寻汉英致使结构使用的规律及其句法语义差异。语料的检索有赖于语料库,但对检索到的语料进行语义分类和对比分析则主要通过人工甄别的方法。

4. 语义要素与语义参数相结合的方法

致使结构中的致使动词有四个语义要素,即致事、致使能量、所使、致使结果。本书重点探讨与这些语义要素有关的八个语义参数:致事的有生性、意图性、自然性和参与性;VP₂的动词属性;所使的自控力和意愿性;致使结果的已然性。因此,本书的致使动词汉英对比主要依赖于语义要素和语义参数的对比,只有把语义要

素和语义参数结合起来,进行全面系统的对比分析,方能全面揭示汉英致使结构的语义句法差异。

本书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八章内容。第一章梳理汉语兼语结构研究的学术背景,回溯前人研究成果,分析其存在的问题。第二章探讨汉英致使结构对比分析的认知语义基础,提出本研究的基本思路 and 主要研究方法。第三章从致事和所使的施力互动关系和致使动词的致使方式入手,建构本研究的语义分类框架。第四章和第五章基于汉英多种语料库中的大量语料,分别对比分析汉英“致让类”和“使让类”这一封闭类致使结构。第六章根据致事对所使的施力控制关系,分别从“命令”类、“派遣”类、“任命”类、“祈请”类和“要求”类等五个语义次范畴入手,对比研究汉英“控制类”致使结构。第七章根据致事和所使之间的施力对抗关系,着重对比分析了包括“劝说”类、“催逼”类和“阻止”类三个语义次范畴在内的“对抗类”致使结构。第八章依据致事和所使之间的和谐关系以及意愿性致使方式,分别对比分析了“意愿类”汉英致使结构,包括“允许”类、“任凭”类和“帮助”类三个语义次范畴。最后是全书的总结。

本书通过以上各章的探讨和研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① 汉语典型致使动词“使”的致让义由使让义动词“派遣”发展而来,使让义是致让义产生的基础,但现代汉语中已很少使用由使让义“使”字构成的兼语结构。

② 致使范畴是由体现致使因果关系的两个微观事件(始因事件和结果事件)所构成的宏观致使事件。致使结构中致事和所使的语义互动关系既存在相互间的对抗、和谐,也存在相互间的控制。其致使方式因不同类别的致使动词可以分为行为性致使(如阻止类)、言语性致使(如劝说类)和意愿性致使(如帮助类)。

③ 致让类和使让类致使结构的主要区别在于 VP₂ 的自主性和致事的有生性两个语义特征。前者的 VP₂ 为[-自主性]动词,致事大多为[-有生性]的实体或事件;后者的 VP₂ 为[+自主性]动词,致事一般为[+有生性]的人或实体。

④ 致让类致使结构中的致事多体现为[-有生性]义征,但汉英优先顺序有别。汉语致让义的“使₁”表示客观致使义时,其相对应的英语动词是使让义的“force”,而不是致让义的“make₁”。所使的意愿性和自控力与 VP₂ 的动词属性和结果事件的类型这两大因素有关。英语致使动词本身标记致使结果的[+已然性],汉语则需附加一些成分,如趋向补语或完成体助词“了”来体现致使结果的已然性。使让类致使结构中的致事和所使均具有[+有生性]义征。汉英差异主要体现在所使的意愿性、致使结果的已然性和致使动词的语义对应性三方面。

⑤ 在控制类致使结构中,除“祈请类”以外,致事对所使具有[+权力层级性]义征,所使处于劣势地位,受到致事的施力控制,“祈请类”则刚好相反。汉英差异体现在致使动词的语义对应性和 VP₂ 的句法表达形式两方面。

⑥ 在对抗类致使结构中,致事和所使之间存在施力上的对抗关系。在语义上,言语性阻止是对劝说类的否定,行为性阻止则是对催逼类的否定。汉英差异主要体现在 VP_2 槽位上成分的句法表达形式。

⑦ 在意愿类致使结构中,致事和所使间的关系和谐,均属于意愿性致使。“允许类”语义特点是“致事对所使意愿的让步”;“任凭类”是“致事不阻碍所使的意愿”;“帮助类”则是“致事支援所使的意愿实现”。汉英差异体现在语义对应和 VP_2 句法表达形式。

⑧ 在“帮助类”致使结构中,汉语存在一个“帮替”、“帮同”和“帮让”的语义连续统,而英语不存在“帮替”义。只有“帮让”义才能构成符合本书探讨要求的致使结构。

总体结论为:汉英致使结构在语义上差异较小,表明了从事件图式到语义世界,基于相同的大脑机能,不同语言文化种群得到的事件图式和语义系统具有一致性,显示出人类对客观世界致使现象和概念化的认知共性。其差异主要体现在句法表达形式上,尤其是在 VP_2 槽位上。汉语 VP_2 槽位上经常出现的是动词(短语),而英语致使结构中则经常出现名词或介词短语。句法表达形式上的诸多差异,表明了基于各自的经验框架,不同语言文化种群抽取的语形标记存在差异性,体现了汉英两种不同语言结构类型的句法特点。

全书的创新之处在于构建了汉英致使结构对比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在理论层面上,基于事件图式和语义结构的句法表达汉英对比,具有普遍的类型学理论意义。根据致事和所使的施力互动关系和致使动词的不同致使方式,建构了致使结构汉英对比研究的语义分类体系。在方法论层面的创新主要表现在跨语言的致使结构对比研究方法。以汉英致使动词为切入点,采用从事件图式到语义范畴再到句法结构的研究路径,对致让类、使让类、控制类、对抗类和意愿类致使结构进行了多维度的语义句法汉英对比。提出了甄别汉英致让义和使让义致使动词的“ VP_2 祈使甄别法”;构建了“帮助”类致使动词的语义连续统图式;提出了“帮”和“帮助”的语义甄别方法;考察了“命令”类、“派遣”类、“选举”类、“帮助”类、“任凭”类等致使动词的义征表达式。

第一章 汉语兼语结构研究的学术背景

汉语兼语结构是典型的致使结构。英语中不存在句法上的兼语结构,却具有语义相对应的致使结构(句法上表现为宾补结构)。为了汉英对比分析的需要,本书采用“致使结构”这一术语。本章重点探讨汉语兼语结构的古今演化轨迹,回溯现代汉语兼语结构研究以及致使兼语结构的研究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第一节 汉语兼语结构的古今演化轨迹

汉语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上溯到距今 3000 多年前的甲骨文。甲骨文是殷商时代语言的真实记录,是我们研究汉语史追根溯源的宝贵材料。就语法而言,甲骨文与先秦文献中的语法结构大致相同,深入研究甲骨文语法,有助于把握先秦汉语语法发展的来龙去脉。据向熹(1993)、郑继峨(1996)、张玉金(2003)考证,兼语结构是甲骨文复杂谓语的一部分。

甲骨文中的兼语结构数量较多,结构已渐趋成熟,但类型较少。只有“使令式”一种兼语结构。使令式中充当第一动词的有“令、呼、使、曰”等,可分为以下几种格式:

I. 使令词+兼+动词+宾+补,此类句子中的补词由“于”字介词结构充当,表示地点和对象,如:

(1) 王令多尹登田于西,受禾。

II. 使令词+兼+动词+宾,如:

(2) 已巳卜宾贞:呼众人于淳。(此例中“于”为动词,是“到”的意思,不是介词。)

III. 使令词+兼+动词+补,如:

(3) 贞:使人往于唐。

IV. 使令词+兼+动词,这类句式是使令式中最简单的一种,如下:

(4) 雀其呼王族来。

甲骨文中构成兼语结构的四个使令动词中,“令”和“呼”两个常用,“使”和“曰”罕用。其中,“呼”和“令”及其所构成的句式是有区别的:

第一,发出“令”这一动作的主体,一般是“王”或“帝”,他们都是大权在握者。发出“呼”这一动作的主体,可以是“王”,也可以是其他人。虽然既有“王令”,也有“王呼”,但含义可能不同,“王令”是王正式下命令,而“王呼”则是国王一般的指示。

第二,在兼语选用式中,第一个使令动词部是“令”,而第二个使令动词则是“呼”,这是主发布命令,由别人传达到接受命令的人们。例如:贞:令何曼呼韦小臣必卒?

第三,“呼”字句的主语常省略,而“令”字的主语常不省略。“呼”字句中的兼语可以省略,也可以不省略,而“令”字句中的兼语常不省略。

商周是我国历史上的青铜器时代。青铜器上的铭文简称金文。较甲骨文而言,金文记载的内容更加丰富,它不仅记载了当时的社会情况,而且还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语言面貌。如果说甲骨文中已开始出现兼语结构,那么到西周金文时,兼语结构的结构已趋成熟。西周的兼语结构从结构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I. 使令词+兼+动词+宾,如:

(5) 王呼尹氏册令师簋。 (《师簋》)

这是金文兼语结构中最常见的结构,使用很频繁。这类结构有时也可以是没有施事。如:

(6) 俗我弗乍先生忧。 (《毛公鼎》)

II. 使令词+兼+动词+宾+补,如:

(7) 武公有南宫柳继位中廷。 (《南宫柳鼎》)

III. 使令词+兼+动词,如:

(8) 弘以告中史书。 (《师旅鼎》)

从兼语动词的语义关系看,金文兼语结构与甲骨文一样,只有“使令类”兼语结构。常用的兼语动词有:“俗、令、呼、命、吏(使)、卑、告、有”等。其中,“有”并不表示存在意义,而是“辅佐”之意,如例(7)。

到了先秦时期,兼语结构已大量存在,以《左传》、今文《尚书》和《战国策》为例,如:

(9) 秦伯使公子势如晋师。 (《左传·禧公二十四年》)

(10) 驱而之薛,使吏召诸民当偿者悉来合券。 (《战国策·齐策》)

《左传》是先秦时代内容翔实、规模宏大的编年体历史著作,与《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合称为“春秋三传”,被奉为儒家经典。全书约19万字,详尽地记述了春秋时期前后250多年间,周王室及诸侯各国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历史。书

中对封建礼仪、社会风俗、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时法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民谚等都有大量的记叙,对上至天子诸侯、下至乐师随从的各个阶层无不触及,对诸侯争霸、战场角逐、婚丧嫁娶、星相占卜的大小场面都有涉猎。可以说,《左传》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了奴隶社会崩溃时期的重大变化,显示了那个时代丰富复杂的社会状况和真实的语言面貌。

从语义关系来看,《左传》中的兼语结构除了“使令类”以外,还出现了“褒奖评论类”兼语结构。常用的兼语动词主要有“使、命、令、遣、召、劝、教、请、求、许、谓”等。如:

(11) 齐侯使夷仲年来聘,结艾之盟也。 (《左传·隐公七年》)

(12) 王遣夏姬归。 (《左传·成公二年》)

(13) 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 (《左传·昭公二年》)

《尚书》约成书于 2000 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最早时它被称为《书》,到了汉代被叫做《尚书》,意思是“上古之书”。汉代以后,《尚书》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所以又叫做《书经》。这部书的写作和编辑年代、作者已很难确定。《尚书》所记载的历史,上起传说中的尧虞舜时代,下至东周(春秋中期),约 1500 多年。《尚书》记载了虞、夏商、周的许多重要史实,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天文、地理、哲学思想、教育、刑法和典章制度等,是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珍贵史料。《尚书》用散文写成,按朝代编排,分成《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流传至今的《尚书》包括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两部分。今文《尚书》共 28 篇,古文《尚书》共 25 篇。现存《今文尚书》传说是秦、汉之际的博士伏生传下来的,用当时的文字写成,所以叫做今文《尚书》。

据考证(周正颖等,2005:41),今文《尚书》大约有 97 个兼语结构例句。从语义关系看,今文《尚书》中的兼语结构除了“使令类”以外,还出现了“任命类”、“有无类”等其他语义类型。兼语动词主要有“命、俾、使、吁、诏、有、罔”等。如:

(14) 惟截截善谗言,俾君子易辞,我皇多有之。 (《尚书·秦誓》)

《尔雅·释话》:“俾,使也。”甲骨文未见此字,西周金文作“卑”,用作兼语动词。

(15) 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尚书·洪范》)

“使”在甲骨文中就已作兼语动词,是个低频词。在今文《尚书》中也是个低频兼语动词,但在后世历代文献语言中却是一个高频兼语动词。

(16) 吁俊尊上帝迪。 (《尚书·立政》)

吁,《说文》云:“呼也。”“呼”是甲骨文和金文中的高频兼语动词,但今文《尚书》已不用作兼语动词,“吁”作兼语动词,为“呼”之同义替代。

(17) 不迪,则罔政在厥邦。 (《尚书·康浩》)

“有无类”兼语结构西周金文尚未见用例,然而在今文《尚书》中结构形式已相

当丰富,不仅有“有”、“无”动词兼语结构,还有“惟(有)”和“罔(无)”动词兼语结构。

《战国策》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史学名著。它是一部汇编而成的国别体史书,作者不明。其中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原来的书名不确定,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全书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共33卷,约12万字。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战国策》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

在《战国策》中,兼语结构以“使令类”最多。据考证(杜焕君,2003),《战国策》中的兼语结构多达790例。其中,“使”字兼语结构357例;“令”字兼语结构204例。仅这两类就占了总数的71%。使令类兼语结构中的动词除了“使、令”外,主要还有“命、招、请、遣”等。值得一提的是,与《左传》中“使”大多用作“派遣”义不同,《战国策》中的“使”不仅用作“派遣”义,而且主要用作“使令”义。如:

(18) 奉养无有爱于最也,使天下见之。 (《战国策·西周策》)

(19) 齐令周最使郑,立韩扰而废公叔。 (《战国策·燕策二》)

(20) 大王诚能听臣,臣请秦太子入质于楚,楚太子入质于秦。

(《战国策·楚策一》)

综合来看,甲骨文兼语结构的形式已比较丰富,但是兼语动词的语义类型很少,因而兼语结构的语义类型亦很少。张玉金(2001)认为,甲骨文只有使令类兼语结构。而后世文言文中除了有这种兼语结构之外,还有褒贬评论类、命名称谓类、有无类等。这些类型的兼语结构都不见于甲骨文。甲骨文中可以构成兼语结构的使令动词只有四个,即“呼、令、使、曰”。据管燮初(1981)在《西周金文语法研究》一书中的统计,西周金文中的兼语动词有15个,如卑、命、辅、令、遣、呼,等等。西周金文兼语动词的高频词是“令”和“呼”,二者用频之和达到117次,西周金文兼语结构的主要语义类型基本仍是“使令类”兼语结构,这与甲骨文兼语结构的语义类型和常用兼语动词基本相同。较之甲骨文和西周金文的兼语结构,今文《尚书》的兼语结构有继承,也有进一步的发展。今文《尚书》兼语结构的语义类型仍以“使令类”为主。但新增加“任命类”兼语结构和“有无类”兼语结构,虽然例子很少,但在后代文献语言中却是常见的兼语结构语义类型。

由此可以看出,兼语结构是一种逐渐发展的句式:先秦以使令派遣类最为常见,褒奖评论类开始出现。兼语结构先由“使令派遣类”发展起来,逐步发展到其他方面,以致到反映抽象思维的褒奖评论方面等。

到了汉代,兼语结构的形式更加丰富,语义类型已基本同于后代文献语言中兼语结构的语义类型。不仅有“使令类”兼语结构,语义类型还包括“封免类”兼语结构等。试以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和东汉班固的《汉书》为例。如:

(21) 陛下过听,使臣去病待罪行间。 (《史记·三王世家》)

(22) 太后遣使者召莽。 (《汉书·佞幸传》)

(23) 平王封襄公为诸侯。 (《史记·秦本纪》)

应该指出的是,与先秦文献中的“使令类”兼语结构不同,《史记》中的“使令类”兼语动词非常丰富,除了“使、令、命、招、请、遣”等本身具有明显使令意义的动词外,还包括许多现代汉语中一般动词、介词或形容词的使动用法,如:

(24) 均之二策,宁许以负秦曲。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25) 西门豹发民凿十二渠。 (《史记·滑稽列传附录》)

(26)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 (《史记·项羽本纪》)

例(24)中的“秦”与“曲”不是偏正关系,而是施受关系,“曲”是“负”的宾语,又因“负”用作使动用法,“负秦曲”即“使秦负曲”——使秦国承担理亏的责任;例(25)中的动词“发”为“派遣”之义;例(26)中的“从”是使动用法,“百余骑”是兼语,“从百余骑”是“使百余骑随从”。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现代汉语兼语句的结构类型和语义类型都基本有了,只是所用的兼语动词的数量和使用频率有所不同而已。从语义关系看,这个时期的兼语结构除了使令类以外,主要包括“封免类”、“命名类”、“褒奖评论类”、“有无类”等语义类型的兼语结构。试以南北朝时期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和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为例。

《世说新语》主要记载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通行本共有6卷,36篇。分德行、语言、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等36门。《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195年的历史。《后汉书》肯定了王道秩序,赞美贤达忠义,鞭挞奸佞邪恶,基本上体现了儒家正统思想观念,因而被定为“正史”。

与先秦和汉代一样,这个时期的兼语结构运用最为频繁的是“使令类”兼语结构。据考证(赵小东,2004),使用频率最高的四个兼语动词是“使、令、遣、有”。其他兼语动词还包括“引、教、命、催、呼、唤、召、招、驱、请、求、放、任、封、取”等。在这个时期,兼语结构在“使令派遣类”上有很大发展,从具体行为义的兼语结构发展到抽象致使义的兼语结构,以致到反映抽象思维的褒贬评论方面等。抽象致使义兼语结构对世界上的人、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叙述清晰,而褒贬评论类兼语结构则使对人的褒贬评议得到生动、明确的体现,因而这两种用法的兼语结构发展也很迅速。其余兼语动词引导的兼语结构不多,或是上古汉语中使用较多,而到了中古时期已经逐渐消亡,开始由其他更有活力的兼语动词所代替,自身逐渐退出语言的舞台,或是中古时期才开始出现,显示出兼语动词的新发展。如:

(27) 既先不相识,王向席有不说色,欲使羊去。 (《世说新语·雅量第六》)